



堰门红军道

杜文涛

陕西省岚皋县堰门镇堰门村有一条近十里的山路,因当年有一支红军部队在这里走过和战斗过,被人们称为红军道。

堰门村村前为汉江支流洞河,河对岸为同省的紫阳县。红军时期进了紫阳县,翻过巴山,便到了“通、南、巴,红军的老家”的以通江、南江、巴中为核心的川陕中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走在这条道路上的红军有69人,他们是中共陕南区党委安康军特支组织发动的国民党绥安军部队起义人员,从安康城出发奔赴四川巴中川陕中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进驻堰门村的时间为1934年2月23日,农历时间为一九三四年正月初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当年便驻防在四川巴中川陕中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当年的这次起义我党历史上称为安康起义。安康起义由中共安康军特支地下党书记王辛德、中共安康军特支地下党军事委员袁作舟、中共安康军特支地下党宣传委员王泰诚三人共同组织发动的。王辛德的公开身份为安康绥安军司令部《民知时报》记者,袁作舟时任安康城国民党绥安军总迫击炮营副营长,王泰诚时任安康城国民党绥安军特务三连副连长。

安康起义原定于1934年2月22日即农历正月初九晚上九时举行,因叛徒告密,被迫提前于当天下午六时左右仓促应变,举行起义。因敌人已有安排准备,在战斗突围后只带出了原计划的少量部队。突出重围的69名起义人员,按原计划会合于安康城外西药王殿山下,当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由袁作舟任纵队长,王辛德任纵队政治委员,王泰诚任纵队游击指挥。

当时驻安康的绥安军部队有一个旅,旅长为张飞生,又名张鸿远。张飞生当天在驻防石泉的下属部队巡查军务。安康起义后,得到消息的张飞生即电电话令沿途所属国民党部队及民团围追堵截起义部队。起义部队连夜急行军,溯汉江南岸而上,经吉河口、火石岩、晓道铺子,第二天中午由大道河老街进入岚皋,为避开洞河街周玉书民团,奔汉江边大道进入街旁柳树沟,再经蛟腊沟、团溪沟、甘沟、熬水沟,翻越莲花寨下到泰山庙,一夜一天,急速步行一百六十多华里后,在第二天傍晚时分进入堰门村。

出生于1927年的陈启桂老婆婆,今年94岁,白发如雪,却耳聪目明,住在堰门村二组卢家院子,已五代同堂。老人说:红军来的那年我七岁多了,已记得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没见过的人,还个个背着枪,八十多岁了,到现在都忘不了。我记得,队伍来这时,天麻麻黑了,村里人见来了队伍都躲到山上花椒树林里,来的队伍有几十号人,都穿着灰军衣,住在卢家院子,卢家四房院子、祠堂院子和马家院子里。队伍上人见屋里没人便到树林边喊,说老乡莫怕,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我们是打和求平的,请老乡们回家吧。胆子大的男人们回家了,见没啥事便喊叫树彪里的人,树彪里的人也都回家了。有三个人住在我家,我在门外不敢进屋,有个人对我说,小娃娃,你莫怕,我们是好“粮子”,不欺负人。三个人说着外口音,抱着枪围着柴火,坐在木凳上靠着墙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我妈给那三个人煮了一顿红苕苞谷粥饭吃了,他们便到下面院子里集合到一起走了。

出生于1959年的卢在宝家在卢家四房院子天井屋的一侧。住在旧屋里的他,说起院里的旧事,他说着去世多年的父亲说过的话。他说他父亲叫卢本群,红军来时二十多岁,那天天冷,他父亲给红军抱来两个花椒树疙瘩熏根烧火烤,院子里住着二十多个红军,天井屋里三个领头模样的人在屋里开会,像是商量啥事,有个高个子背上背个长把子,手上还捏个短壳子,门口有三个人在放哨。

时光遥远,更缺少准确的文字记载。根据1985年12月

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辑的《陕西党史安康起义专题资料集》记载,在屋里临时开会的三位红军,应该便是纵队的三位首长。他们是纵队长袁作舟,纵队政委王辛德,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

当年三位红军纵队首长开会的地点在卢在宝家左侧一处空屋地基,原老房是卢哲学家的,老人已经去世,儿孙们都进了城,房子没人住,前两年下大雨漏水便垮了。三位共产党党员,三位腥风腥雨里的红军指挥员,在这空屋地基上曾经的屋里,那晚,他们都说过怎样的话,他们是怎样面面相觑,谁北谁南,谁西谁东?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八十年前红军进驻堰门村的事,在村里人中口口相传着。

卢在宝和村里老人们介绍说:红军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在在的地方煮饭吃。那时穷农民家里也没啥吃的,都是些红苕、洋芋,好的便是些苞谷米。红军吃了给的有银元,也有给打借条的,吃完饭就以拍枪托为号,到祠堂院子旁边的田坝集合。集合后红军便往洞河边走,想趟水过河进入紫阳县。队伍刚下到河边茅草庵时,洞河对岸紫阳县庙沟国民党民团一个团丁向红军连开数枪,走在队伍最后面的一位红军小战士被击中牺牲。那团丁开枪后便往身后的板寮寨山上跑,队伍里一位红军跑向河边,趴地举枪,一枪便撂倒了那团丁。红军小战士牺牲后,当地老乡便组织领导的委托,将其埋葬于洞河东岸翠家湾山下。埋葬时,村上一位老秀才对着小战士坟头说:“长眠吧!”后来村民口耳相传,把“长眠吧”叫成“长眠坝”。现在,在洞河岸边,即小战士长眠处,有一条长的沙滩,当地群众为了纪念红军,把这条沙滩叫做长眠坝。

修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卢氏祠堂,藏着卢氏先民的过去,也记着红军的往事。卢氏祠堂当晚也住着十多位红军,这是卢家四房院子下往河边的捷径处。天亮时分的起步,三位红军指挥员也许是从这清代老屋前走过的。流年湮蚀里,屋子已显破旧,露出陈年的质感,漫着深幽幽的往事。从这里再出发,前方,有着一一条条沟壑一座座山坡,有着一个个未知一场场战斗。党史资料上记载,起义的红军队伍为避开卢沟卢彪民团和洞河街周玉书民团,顺洞河而下三四里许,从堰门村下游的春村曹家老院子门前涉水渡河,溯红岩口沟而上进入紫阳县。正月十一经苗河,过深磨;正月十二宿营高桥乡龙凤寨;正月十三经铁佛寺抵达绕溪乡;正月十四进入联合乡盘磨河;正月十五清晨过营盘大梁时,误将团丁当向导,误入国民党紫阳驻军王耀晨团和紫阳坝镇李靖山民团重兵包围。经过一整天激战至夜晚九时,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壮烈牺牲,纵队政委王辛德等大部分官兵被俘,纵队长袁作舟带领十多人成功突围,最终到达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纵队政委王辛德等被俘人员后被押回安康集体枪杀。纵队长袁作舟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在反击刘湘六路围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解放后前几年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地方党史记载他时把他列为下落不明人员。2016年,省、市党史部门通过大量走访,前往巴中市查阅历史档案,发现当年红一纵队一部在纵队长袁作舟的率领下成功突围,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战斗,经紫阳黄草梁到达川陕根据地与红三十军会合,会合时部队仅剩四人。到达川陕根据地后,红一纵队的番号被保留下来,袁作舟仍为纵队长。为巩固川陕根据地,袁作舟于当年八月在反击刘湘六路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四川省党史部门编辑出版的收录了13.8万名红军将士名录的《英名壮巴山》一书和巴中城外南郊红军万人烈士陵园石碑上记载了袁作舟的名字。烈士陵园石碑上他名字后刻着“袁作舟(???-1934年)陕西人,安康起义领导人”。

袁作舟下落的发现,使党史部门得出安康起义

新的历史结论,即安康起义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起义是成功的,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南的统治,支持了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纵队政委王辛德,又名建英,陕西洋县东韩村人,1911年生人,牺牲时23岁。王辛德就义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去刑场路上,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汉江苏维埃万岁”等革命口号,并在刑场向群众讲话,激励革命后来者,其英雄气概广为流传。

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191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牺牲时22岁。王泰诚的哥哥王泰吉黄埔一期毕业,陕甘边区创办人之一,曾任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后也壮烈牺牲。解放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革命公园建立了“王泰吉、王泰诚烈士纪念馆”,永志缅怀。习仲勋同志与王泰吉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曾写过一篇《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的文章,刊登在1984年3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纵队队长袁作舟,陕西澄城县人,生年不详。1927年考入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学习,1931年,任安康绥安军司令部迫击炮营一连连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迫击炮营副营长。

堰门红军道上的红军浴血战斗的英雄壮举,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沿途的人们群众。岚皋建国后的第一部县志,即1993年版的《岚皋县志》记载了这一壮举。1989年版的《紫阳县志》也记载了这一壮举。近几十年出版的《陕西党史安康起义专题资料集》《陕南革命斗争史》《红色记忆》《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老区》《陕南军事斗争资料汇编》《岚皋县党史》《紫阳文史资料》等史志文献,都先后记述了安康起义红一纵队的英雄事迹。

堰门红军道上的红军故事吸引了县内外的人们纷至沓来。为使前来的人们有更好的旅游和食宿便利,当地沿着红军道广植观赏与经济兼备的黄桃,打造着红军道十里桃花景观。还利用卢氏祠堂及红军屋旧址,正在建设着红军道展示馆。

春天的桃花盛开着,它们沿着当年的红军道红扑扑地绽放着。一棵树,一行树,在堰门的山坡上,蜿蜒而又生生不息地行走着。



新诗与白话小说的出现

中国是诗的国度。新文化运动正是以新诗开其端,从而翻开了中国文化新的一页。人们历来认为,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一直长期占据着文学正宗地位。《新青年》首倡“文学改良”乃至“文学革命”,要求新文学“不摹仿古人”,“这无论文言白话都是一样,而用白话入诗,比较更难”。白话新诗的出现,在正统者看来,就无异于洪水猛兽了。

《新青年》以同人杂志复刊的首期,即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刊发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白话新诗9首,这是后世公认的白话新诗第一次正式出现。胡适虽在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过《朋友》(即后世所称《两只蝴蝶》)等新诗,但他曾再三说自己“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只是“尝试”而已。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适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因此往往把四卷一号“三巨头”的诗作为中国新诗的始作。唐庚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是如此以为,而且特地作了这样的说明:“确切地说,白话诗当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所载的诗歌算起。”

为倡导白话新诗,当时《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几乎都曾粉墨登场”,如李大钊、沈兼士、周作人、陈衡哲、陈独秀和周树人等,也“为刚刚诞生的新诗‘摇旗呐喊’”,使得新诗坛一时“红杏枝头春意闹”。但当时“绝对诗才横溢且持之以恒地进行艺术探索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少得可怜。”周作人曾对此有过相当清醒的评价:“那时候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

沈尹默为《新青年》写的新诗,有《月夜》《鸽子》《人力车夫》等18首。从沈尹默新诗取材的内容看,“亲民”这一本视角是其鲜明的导向,而且如胡适等人所言,沈尹默的新诗多从古乐府、旧词、曲里脱胎出来,在音韵、结构、意境、用字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这18首新诗里的《三弦》(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刊发)被公认为是新诗的代表作,曾被收入中学的国文课本。

蔡元培对沈尹默的新诗极为赞赏,他为沈尹默《秋明室诗稿》所作序称赞其诗“独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宜乎君所为新体诗,亦复蕴藉有致,情文相生,与浅薄叫嚣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刊发的《月夜》,只有短短四行,却被誉为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而具有短诗美德”。废名在《谈新诗》中评价说:“与《月夜》同刊的那些新诗,正是不能有这个散文诗的美德,乃是旧诗的余音。”沈尹默这首诗初看平淡无奇,细品则“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

沈尹默的诗词创作以古典诗词成就最高,虽然在晚年说自己的白话新诗“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但其开启白话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与沈尹默并称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胡适,对尹默的新诗备极推崇。胡适在驳斥一些人把新诗视为洪水猛兽,贬得一无是处时,就列举尹默新诗《月夜》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在笔者看来,这首诗似有更深的意象——可以看作是在那个千年未有的大转型时代,沈尹默用新诗为《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所做的一种形象宣言吧!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新青年》力推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不是其第二、三卷,也不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新诗“三巨头”“粉墨登场”和第三号(1918年1月)刘半农与钱玄同演的“双簧戏”《答王敬轩书》,而是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创造了“真文学”“活文学”和“真正国语文学”,不仅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更正式宣判了“假文学”“死文学”寿终正寝,成为“文学革命”的典范。这是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也是作者周树人第一次起用鲁迅作笔名。它就像一声惊雷,石破天惊,横空出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成为重要标志。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在《新青年》上使用“唐俟”“鲁迅”等笔名共发表54篇作品。鲁迅由此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树人说自己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就想在绍兴会馆抄古碑中“暗暗消去生命”。面对钱玄同“你可以做一点文章”的邀约,有了著名的“铁窗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然而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曰:“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此后接连几天,钱玄同都来拜访周树人,在钱玄同的催约下,周树人渐觉希望在于将来,确不可抹杀,便答应为《新青年》撰稿。

鲁迅思想的深邃、锐利和笔力之沉雄、犀利,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一致认可。他和弟弟周作人虽不在《新青年》同人之列,却备受讨论有关《新青年》的重要事宜。陈独秀后来在给周作人的信中给鲁迅的小说表示由衷赞赏:“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后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专门提到:“《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

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从鲁迅日记看,自《新青年》组建编辑部后,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都在不停鼓动他创作小说、散文及诗歌,而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就这样,在一篇篇“遵命文学”中,鲁迅逐步走出了自我的“彷徨”,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主将。

《新青年》虽从第四卷第一号始,已在刊载白话文和使用新式标点,但《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全面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排版,是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开始的。“一代名刊”的这一做法,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报刊。《新青年》主推的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促使政府颁布训令和批准有关议案,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旋即在全国各类学校课本中开始普及,遂使白话文风行全国,代替文言文获得了语言的正统地位。语言和文字统一,则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掌握文化,方便生活,使人民的思想得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解放。

而《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轮值主编,正是沈尹默。除此期之外,沈尹默还编辑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第六卷第六号。沈尹默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因为眼睛有病,且自付非所长”,因此轮到他编辑时,请玄同、半农帮忙代编,并说“编辑委员则仅付名义而已。”这固然不可全看作是谦辞,但也说明《新青年》同人虽是自愿组合编刊,但其相知相惜情谊深重。周树人、周作人兄弟虽不具体编刊,但二人撰稿甚多,且对办刊操心甚多,故也往往被看作《新青年》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中称:“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和稍后进校担任国文系教授的吴虞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随后陈大齐、王星拱等一大批主力教授群体和更多的追求进步的学生群体加入作者队伍,《新青年》成为胡适所说的“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因为北京大学一批知名教授加盟,自第四卷第一号改为同人杂志,致力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发行量增至1.5-1.6万册。”

《新青年》同人竭力发起白话文运动和直译运动为标志的文学革命,“是力图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结合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文学创新”,借以传播新思想,推广国民教育和开启民智。在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语法,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开展现代白话汉语的重构。因此说,现代白话文乃至新文化运动,启动了国民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

正因为《新青年》在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执牛耳”的影响力,与其相呼应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以及后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雨丝社”等新文学社团迅速崛起,加之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各类学术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和与其相抗衡的国故派、学衡派、调和派、玄学派们,展开新旧思潮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激战。(中)

汉阴县老体协副主席兼柔力球协会会长张纯新女士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却像经霜的枫叶,越来越红艳,越来越明媚。她退休前是人民教师,30多年的教书生涯,在工作中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多年来积劳成疾,临退休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多处向医院求诊,异常艰辛。身体好了后,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恰逢当时柔力球运动在全县推广,她毅然选择了这项运动,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八九个年头了。

柔力球运动没有捷径可走,必须练就扎实的捻拍基本功。手指能很好地捻拍,顺利地正反绕翻,是学习柔力球的基础。为此,她每天坚持捻拍300至500个,不分天晴还是下雨,凭着对柔力球的喜爱,加上脑子灵活,她很快就掌握了柔力球捻拍技术,并且能熟练地打套路。在这期间,她看到网上有人打双拍,她毅然决定练习双拍。2014年9月,她在丈夫的陪同下自费到河南学习双拍双球技术。2014年10月,她约了3位好友到凤凰广场练球,当时练双拍的人很少,她们的双拍双球运动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凡是加入的队员,她都一拍一拍地教,一节一节地讲。一场教学下来,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但张纯新凭着十分耐心,硬是带着爱好者走上了强身健体之路,队伍由3人发展到现在近百人。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多年来,张纯新一直在探索柔力球教学的方法,到河南、武汉、安徽、福建、北京及西安学习交流,每次都是自费,花费超过万元。她把自己所学完全无偿传授给学员,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倾尽了全部心血。

2016年9月,参加全国老体协举办的首届柔力球双球双拍培训展示活动,她带团队荣获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优秀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她个人获得翠芳艺术中心颁发的“突出贡献奖”。2017年4月,她带队10人到福建武夷山学习双拍套路,成绩合格,10位姐妹都获得“二级社会指导员证书”。2019年9月,团队参加全国首届双拍双球网络视频大赛,在张纯新的严格训练下,大家齐心协力,组队22人参展套路《光荣与梦想》,获得优胜奖。

2020年初,张纯新担任汉阴柔力球协会会长。自她任职以来,就以身作则,讲求奉献,浑然忘我。在团队建设,不光重视思想工作,也注重技术骨干的培养。在她的培养下,双飞队中先后涌现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才为汉阴柔力球的普及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纯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她教授学员那股劲真是太严厉,太认真了。她教的动作规范,到位,学员有疑惑不解的地方,她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讲解示范,对学员动作不到位的地方,她总是耐心讲解。学员们佩服她的毅力和耐心,新学员都不好意思打退堂鼓,跟着她更加认真勤奋地学习。

2020年7月,她自费学习李翠芳创编套路《人在青山在》的视频内容,头几天对着视频反复练习,然后把学懂的内容全部记住,第二天和双飞队骨干张龙翠一起把所学内容都教给学员。视频学习难度很大,要反复观看很多次,然后又一拍一拍地分解教给大家,而这套动作本身难度也很大,有的学员练一练打起了退堂鼓,不想学了,每当这时,她总是给学员打气,坚持下去就会成功。

经过近2个月的勤学苦练,双飞队全体队员最后终于把《人在青山在》学成了。2020年10月,组队参加“九九重阳”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网络赛,个人和团体都获得优秀奖。2020年11月,参加“抗击疫情,健康同行”全国第二届柔力球双拍双球网络交流活动,集体、个人获得优胜奖。

张纯新就是凭着对柔力球的热爱,把柔力球的事业办得红红火火。她说:“只要我的付出能让我与队友一起快乐,也就值得了。”就是凭着这个初心,她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也让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获得了快乐。



思念的小船

汉滨初中七年级九班 吕奕达

“黄包车”承载着童年,“糖墩子”很甜,心率仪滴滴答答地数着时间,小河在故乡陪伴着爷爷。小时候,我们生活在小镇子里。小镇很小,阳光很甜,时光很慢。

阳光毫不吝啬地从床边的窗户洒在我脸上。我从床上坐起,向客厅走去,你早已等候多时,帮我洗漱后,送我去幼儿园。坐你的车去上学充满安全感,我在后面看你开车的样子是那样认真,满是皱纹的双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褐色的眼镜架在不高的鼻梁上,双眼专注地盯向前方,却满面春风地和我聊天,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幸福,就连岁月留下的皱纹和老人斑都充满笑意。

下午放学,老远就看见你站在校门边望着院内。望着望着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向我招手,又三步并两步地走来,拉着我的手坐上我独享的“黄包车”。你的手很大,很粗糙,但又很温暖。回家路上,经过一家烧饼店,你回过头问:“饿了吧?先吃个‘糖墩子’起来,别等我回家,你就下车走进小店;‘老板,拿个‘糖墩子’。”一会儿,你便拿来一个热乎乎的饼子:“来,趁热吃。”我在后面吃着馍,你在前面哼着歌,一老一小,日复一日。一路上,撒下了许多笑声。

那时还可以搭着板凳坐在小院里,看看夕阳一点点地西沉,牵挂的人,就在身旁。

去年夏天,你得了病,躺在医院里大半个月。家人去看望你,盛夏黄昏的阳光如瀑布,斜射进病房,打在你憔悴的脸上。窗边的心率仪“滴滴滴”地响着,不紧不慢地数着傍晚的时光。我帮着护士给你换药,扶你去厕所,陪你聊天……你躺在病床上微笑着,那是发自内心的幸福的微笑!

你痊愈了,又回到了老家。我常给你打电话,你总笑着说:“我和你奶奶在河边锻炼哟!”

现在,我生活在小城里,与你相隔很远。小城里大,却很孤单。我只能把牵挂折成小船,顺着梦的溪流漂向老家的小河……你开着“黄包车”,我吃着热的“糖墩子”我们笑着,一路夕阳向晚。爷爷,你离我那么远,又离我那么近,唯一不变的,是我对你的牵挂与思念。

爷爷,你看到我思念的“小船”了吗?



《独角兽》 江仁君作 市一小1年级3班

沈尹默曾编辑的《新青年》